

司马迁生年研究

生

· 年



研

· 究

张大可 /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司马迁生年研究

张大可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司马迁生年研究/张大可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9

ISBN 978-7-100-16751-2

I. ①司… II. ①张… III. ①司马迁(约前 145 或前 135—?)—人物研究
IV.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44283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司马迁生年研究

张大可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洲际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751-2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17

定价:88.00 元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双一流”特聘教授系列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刘家和 瞿林东 郑师渠 晁福林

主 任 杨共乐

副主任 李 帆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宁 欣 刘林海 安 然 张 升 张 皓

张 越 张荣强 张建华 吴 琼 周文玖

罗新慧 郑 林 庞冠群 侯树栋 姜海军

郭家宏 耿向东 董立河

出版说明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北师大历史学院业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是国家“211”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单位，首批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单位；拥有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一系列学术平台，综合实力居全国高校历史学科前列，被列入国家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行列，正在向世界一流学科迈进。在教学方面，历史学院的课程改革、教材编纂、教书育人，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曾荣获国家教学改革成果一等奖。在科学研究方面，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出版了由白寿彝教授任总主编、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后，一批底蕴深厚、质量高超的学术论著相继问世，如十卷本《中国文化发展史》、二十卷本《中国古代社会与政治研究丛书》、三卷本《清代理学史》、五卷本《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二十三卷本《陈垣全集》和《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上博简〈诗论〉研究》等巨著。这些著作皆声誉卓著，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得到同行普遍好评。

上述著作外，历史学院的教师们潜心学术，以探索精神攻关，又陆续完成了众多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在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上连创佳绩，始终处在学科前沿。同时，历史学院的“国家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双一流”）特聘教授们也为此创获颇

多，做出了不少贡献。为了集中展示历史学院的这些成果，我们组编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希冀在促进北师大历史学科更好发展的同时，为学术界和全社会贡献一批真正立得住的学术力作。这些作品或为专题著作，或为论文结集，但内在的探索精神始终如一。

当然，作为学术丛书，不成熟乃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编辑委员会

内 容 简 介

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即生于公元前 145 年与生于公元前 135 年两说，自王国维 1917 年开启司马迁行年研究以来，至 2015 年纪念司马迁诞辰 2160 周年重启论争，历经百年，学术界开展了三次全国范围的学术大讨论：1950 年代中、1980 年代初、2010 年代中，参与研讨的学者前后 48 人，发表学术论文 91 篇。本书《司马迁生年研究》八讲，系统梳理了百年论争司马迁生年两说的论点、论据。经过作者总盘点，证实王国维说，“十年之差由数字讹误造成”。王国维的考证“前 145 年说”，论点坚实、方法正确、逻辑严密，结论成立，而论据粗疏，应予纠正。“前 145 年说”后继论者，运用文献和史实考证，合于“前 145 年说”的行年关节点有六大证据，有师事孔安国、董仲舒两大旁证，以及交友六条证据，共十四条证据，足可定案司马迁生于前 145 年。李长之、郭沫若主张的“前 135 年说”无一考据，“前 135 年说”后继论者的“新证”无一实证，以辨代考，精制伪证伪考和循环论证，“前 135 年说”不成立。作者是在汇综自己参与论争发表的多篇论文基础上梳理为百年论争八讲，有七篇论文附后。故本书内容正论八讲，与附录论文之间略有重复，两者对照亦可反映作者亲历论争的过程与思维发展，不无意义。论文论说与八讲有相异的地方，以最后梳理的八讲为准。附录的七篇论文中，作者参与两次论争撰文五篇；另两篇，其中有一篇作者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陈曦教授，另一篇作者为江苏省海外发展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朱枝富。陈曦、朱枝富两位作者直接参与了当前第三次的论争，故所撰论文附于本书，以飨读者，特此说明。本书作者张大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讲 王国维考证司马迁生年的贡献与疏失	7
第二讲 考证司马迁行年的文献资料	23
第三讲 司马迁生年“前 145 年说”之证据	35
第四讲 “前 135 年说”之源，郭沫若、李长之的 举证无一考据	48
第五讲 “前 135 年说”后继论者的“新证”无一实证	57
第六讲 “前 135 年说”论者袁传璋在考证烟幕下精制 伪证伪考	85
第七讲 司马迁生于公元前 145 年可以为定论	110
第八讲 司马迁创作系年（附司马谈）	124
附录一 司马迁生年研讨论文七篇	134
司马迁生年考辨	135
评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之新证	158
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论争述评	169
评“司马迁生年前 135 年说”后继论者的新证	193
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论争的意义	212
李长之关于司马迁生于前 135 年说举证十条无一考据	227
评司马迁生年“前 135 年说”论者的两大“曲说”	238
附录二 司马迁生年研究百年论争论文索引	254

引 言

—

司马迁生年并存两说，源于唐代形成的《史记》三家注。《史记索隐》司马贞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即公元前 108 年，司马迁二十八岁，上推生年为公元前 135 年。《史记正义》张守节说，汉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 104 年，司马迁四十二岁，上推生年为公元前 145 年。两说年差正好整十年。两说并存，分别省称为“前 135 年说”与“前 145 年说”。

1917 年^①，王国维开启了对司马迁行年的研究，从此，司马迁生卒年成为一个学术论争的课题。至 2015 年纪念司马迁诞辰 2160 周年，司马迁生年的十年之差，又一次成为论争的话题，自王国维以来正好一百年，可以说是一个百年论争的老话题。王国维考证主“前 145 年说”，论证内容定格在《太史公行年考》中。本书《司马迁生年研究》，分为八讲，承接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是考察司马迁一生的行年，而书名为“司马迁生年研究”，旨在凸显司马迁“生年研究”四个字，有两大意义：一是司马迁行年中的生年两说有十年之差，论争已历百年，几代人的殚精竭虑，应该有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二是定案司马迁的生年，必须考定司马迁一生的行年来验证，任何孤立地考证司马迁的生年，或者寄希望于地下的铁证，都是徒劳的。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与《报任安书》中，留下了较为丰富

^① 1917 年王国维发表《太史公系年考略》（据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96 页），学术界一直误传为 1916 年。

的行年资料，据之可以定案司马迁的生年。反过来说，任何一条孤立的所谓“铁证”，也不能违背《史记》留下的司马迁行年资料呈现的人生轨迹。司马迁为《史记》而生，为《史记》而死，他的生命化成了《史记》，他的行年资料伴随《史记》的成书过程而遗留，离开《史记》成书，抽象考察司马迁的行年和生年，不会有定论。学术贵歧，但要征实，固执己见，用力愈勤，愈将步入歧途。这一点，通过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的百年论争梳理，给我们留下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司马迁自己不能写下他的卒年，也没有记下自己的生年。由于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也没有记载生卒年，于是留下千年疑案。学术界推论司马迁生年有六种说法^①，卒年有八种说法^②。司马迁生年定格他的人生经历，直接涉及《史记》写作的时代背景，对于《史记》成书有极大的影响，因而也成为司马迁行年研究的重中之重。司马迁卒于《史记》完成之后，因而他的卒年对于《史记》成书的直接影响，比起生年要小得多，所以《史记》三家注只对司马迁生年做了注释，而对卒年未予关注。但是，司马迁的卒年涉及他一生的年岁，毫无疑问也是一个行年研究的重大问题。司马迁一生的重要行年关节点，对于《史记》成书，以及考证司马迁生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本书八讲一一关注，而最终成果编定《司马迁行年表》，用以验证和定案司马迁生年，这就是本书研讨的宗旨。

二

学术界第一个考定司马迁行年的学者是王国维。1917年，发表

① 司马迁生年有六种说法，除众所周知的王、郭两说外，另外四说为：其一，生于景帝四年戊子（前153）说，此说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子长游踪》条；其二，生于汉景帝后元戊戌（前143）说，此说见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四十一；其三，生于武帝元光六年壬子（前129）说，此说见张惟骧《太史公疑年考》；其四，生于汉武帝元朔二年甲寅（前127）说，此说为华山道士所主张，见康熙《韩城县志》载翟世琪《重修太史庙记》。这四种说法，持说者均无论证与文献依据，大抵出自臆断，皆无讨论价值，可以不论。

② 司马迁卒年的八种说法，详见本书第七讲。

《太史公系年考略》(收在《广仓学究丛书》中),据《正义》推定司马迁生年为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故学术界通称为“景帝中元五年说”,或“前145年说”,又省称“王说”。1923年,王氏针对日本学者桑原鹭藏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的新说^①,重发他的考证文章,收入《观堂集林》卷十一,改换题目叫《太史公行年考》,全文不变,仅在题目上改“系年”为“行年”。这一字之改,用以昭示考证司马迁生年的方法,即排比行年为论据,十分自信。

1944年,李长之撰《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②,据《索隐》立说,举证十条论证司马迁生年为公元前135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根据王国维的考证,1955年是司马迁诞辰2100周年。郭沫若在当年《历史研究》第六期上发表《〈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支持李长之主张,学术界通称“建元六年说”或“前135年说”,又省称“郭说”。

“郭说”阻止了1955年学术界纪念司马迁诞辰2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引发了1950年代中期的学术大讨论,这是第一次,重心集中在司马迁生年王、郭两说的十年之差上。之后,由于历史的原因,讨论沉寂了近二十年。到了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初,争论再起,这是第二次,重心仍集中在生年问题上。两次论争,势均力敌,于是司马迁生年由《史记》三家注并存“两说”,转而成为近代以来百年论争并存王、郭两说。本书为了便于行文,以下论说以“前145年说”与“前135年说”,分别指代王说与郭说。

纵观百年论争,“前135年说”论者多为以辨代考,论文数量占优;“前145年说”论者以考据为主,论文理据占优,故成为主流论说。1985年,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在南京召开年会,率先以“前

^① 桑原鹭藏:《关于司马迁生年之一新说》,1922年刊于日本《东洋文明史论丛》;1929年重发于日本《史学研究》第一卷第一号;后收入《桑原鹭藏全集》第二卷。该文以“早失二亲说”证司马迁生年为公元前135年。中国学者李长之将之引入《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之中,列为第一条立说证据。

^② 李氏文章最早发表在《中国文学》第一卷第二期,1944年5月,后收入李氏专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中,开明书店1948年版。

145年说”为据，隆重纪念司马迁诞辰2130周年。1995年，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在西安召开纪念司马迁诞辰2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年中国史记研究会成立，于2005年、2015年两次在司马迁故里陕西韩城市、陕西渭南师范学院召开纪念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2160周年学术研讨盛会。特别是2015年由中国史记研究会与陕西渭南师范学院联合主办的纪念司马迁诞辰2160周年国际性学术研讨盛会，中国史记研究会推出了《史记论著集成》二十卷、《史记论丛》专辑六卷、《史记通解》全九册三大论丛，以及《中国史记研究会十五年》专集，总字数两千余万字，可以说是对1955年缺失的纪念司马迁诞辰2100周年学术盛会的一次补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前135年说”后继论者，近年来不断发声，再次提出所谓“新论”，连续有五六篇论文论证《太史公自序》写有司马迁生年，并要求在2015年纪念司马迁诞辰改2160周年为2150周年，于是司马迁生年的话题重启。中国史记研究会、北京史记研究会在2016年两研究会召开的年会上，同时展开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的研讨。两会秘书处组成联合编委会，相继编辑了《史记论丛》第十三集^①、《史记研究》第一辑^②，发表论辨文章。《渭南师范学院学报》也于2016年至2018年为论辨提供研讨阵地。此次论争是第三次，可称之为2010年代中的论争，规模虽然不及前两次宏大，但质量更高。从王国维启动司马迁行年研究的1916年，到2016年开展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论争梳理，恰好整一百年。

本次论争的特点不是寻求新证据来立论与驳论，而是回头看，系统梳理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两说百年论争的论点与论据，做一个阶段性总结，力图在百年论争梳理的基础上做出对司马迁生年的定案。也就是说本次论争是司马迁生年研究在现有存世文献基础上的终结论争与总结。

^① 《史记论丛》第十三集，载司马迁生年研究研讨论文10篇，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

^② 《史记研究》第一辑，载司马迁生年研究研讨论文3篇，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三

笔者参与了百年论争第二次大讨论，在1980年代初撰写了《司马迁生卒年考辨辨》^①、《评“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之新证》^②两文，旗帜鲜明支持“前145年说”。笔者先前作为中国史记研究会时任常务副会长，在2005年主持了以“前145年说”纪念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学术研讨会；后作为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在2015年又主持了纪念司马迁诞辰2160周年学术研讨会，自然被卷入第三次大讨论的中心。毋庸讳言，笔者自然成为“前135年说”后继论者挑战的重点对象，也是百年论争梳理的主要论文作者。笔者在本次论争中着重从方法论梳理百年论争，撰写论文三篇；国防大学陈曦教授针对“前135年说”代表论说者撰写驳论三篇；江苏海外发展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朱枝富撰写若干问题辨正一篇。共七篇。加上笔者在上一次论争中撰写的论文两篇，合计九篇论文。九篇论文各自针对具体的专题立论。笔者于是综汇九篇论文并进行了系统的勾勒与补充，系统梳理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论争几代人的成果，以“司马迁生年研究”为题成书，分列为八讲。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将这一课题列为系列学术讲座之一，笔者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受邀为主讲人，十分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提供的这一神圣的学术平台，深化了这一课题的研究。八讲作为正文，为正论，九篇论文选列七篇为附录。八讲正论与七篇论文的关系，相当于总论与分论，前后对照，若干细节略有重复，但补充的意义大于重复的瑕疵，同时体现论争过程，故不避重复之嫌，以飨读者。论文论说与八讲有相异的地方，以最后梳理的八讲为准。

八讲内容，前三讲正面梳理“前145年说”的论点、论据。第一讲评说王国维考证的得失。得，指王国维开启了司马迁行年研究，

① 该文原载1982年《甘肃省历史学会论文集》，部分内容以《关于司马迁生年的考辨》为题，载《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全文收入《史记研究》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该文首发《求是学刊》1984年第3期，亦收入《史记研究》论文集。

指明了方向、方法；失，指王国维若干论据的瑕疵，予以纠正。第二讲，梳理定案司马迁行年研究的文献资料。第三讲，汇集百年论争“前145年说”的论据，系统考证司马迁的行年轨迹。第四、第五、第六三讲，对“前135年说”之源郭沫若、李长之的论说，以及后继论者各时期代表人物的论说予以梳理。前135年说，其源，无一考据；其流，无一实证，其中最精制的考证终结于循环论证，故“前135年说”不成立。第七讲，总论。梳理双方的总成果，制定《司马迁行年表》，做出简洁的总结。司马迁生年两说只并存于三家注，王、郭两说，王真郭伪不并存，司马迁生于前145年可以为定案。第八讲，勾勒司马迁创作系年，即年谱简编。两个附录：其一，刊载司马迁生年研讨的七篇论文；其二，刊载笔者所目见的百年论争论文索引。

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论争的三次学术大讨论，参与论争的学者前后有48人，笔者搜集到的学术论文就达91篇^①，还有作者未目见的约20篇未收入，双方学者提出的各种推理论据以百条计，重复与雷同者居多。因此，本书梳理百年论争，引据双方学者的论点、论据，一般只称引甲说乙云，没有必要一一注明出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书后附录的“论文索引”中按核。重点评说与称引的是百年论争双方的代表者。“前145年说”论者，首发者王国维，后继论者，1950年代主要有钱穆、郑鹤声、程金造，1980年代有张大可、施丁、徐朔方。“前135年说”论者，首发者为李长之、郭沫若，后继论者，1950年代为施之勉、王达津、赵光贤，1980年代为李伯勋、苏诚鉴、吴汝煜、袁传璋。当前论争的核心代表者，主“前145年说”论者为张大可、陈曦、朱枝富；主“前135年说”论者为袁传璋、赵生群。袁传璋是“前135年说”后继论者的集大成者，本书第六讲特立一个专题评说，予以说明。

以上是为引言。

^① 笔者搜集目见的48位作者，91篇论文，详本书附录二：“司马迁生年研究百年论争论文索引”。

第一讲 王国维考证司马迁生年的 贡献与疏失

一、王国维考证司马迁生年为公元前 145 年， 论点坚实，方法正确，逻辑严密

考证司马迁的生年，王国维和郭沫若两家都是根据《太史公自序》的三家注来推算的。

(一)《史记》三家注并存司马迁生年两说，有十年之差

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太史公自序》云：“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司马贞《索隐》在这一句下注云：

《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元封〕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

元封三年，即公元前 108 年，司马迁年二十八，据此推算，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 135 年。

司马迁当了五年太史令，汉武帝改元太初，颁布新历，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司马迁参与其事，十分兴奋，正式定稿《史记》，故张守节《正义》就在“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加按语说：

案：迁年四十二岁。

太初元年是公元前 104 年，迁年四十二，据此推算，当生于汉

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 145 年。

司马贞与张守节均为初唐同时代人，又师出同门，都是张嘉会的学生，两人的记载都值得关注，于是司马迁有了两个生年，即前 145 年与前 135 年，且有十年之差。王国维启动司马迁行年研究，首发《太史公行年考》，主“前 145 年说”。郭沫若驳难王说，撰文《〈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主“前 135 年说”。双方后继论者展开论争，历经百年，有三次高潮：即 1950 年代中、1980 年代初、2010 年代中，迄今无定论，司马迁生年两说并存。本书专题梳理百年论争，从头说起，故以“王国维考证司马迁生年的贡献与疏失”为题开篇，是为第一讲。

（二）王国维考证有三长：论点坚实，方法正确，逻辑严密

司马迁生年两说并存，逻辑上就有三种可能：一是两说皆误；二是两说均不误，数据各有所系；三是两说一真一假。《索隐》语出有据，取《索隐》舍《正义》也似乎说得过去。例如赵光贤就说，《正义》按语“来历不明”，怎能凌驾于《索隐》所引“《博物志》所载有最高价值的原始材料之上呢”^①？王国维毕竟是大家，他思维缜密，用考证来在三种情况中做出最正确的选择。王国维的考证分为三步：第一步，首先调查十年之差的原因在哪里？有两个可能：其一，两说的材料来源是否不同，是否可靠，这是头等大事；其二，两说同源，十年之差是在流传中发生了数字讹误。王国维依据汉简的书法行文款式，证明《索隐》所引西晋《博物志》保存的《茂陵中书》是可靠的先汉记录，说明《索隐》所引文献可靠，材料有据，没有问题。由于《索隐》与《正义》两说并无辩驳关系，《正义》直以按语出之，乃必然的逻辑，两说引据材料同源，或《正义》直接的依据就是《索隐》。王国维认为《索隐》《正义》资料来源同为《博物志》，十年之差是其中一说在流传中数字发生了讹误。这一考

^① 赵光贤：《司马迁生年考辨》（写成于 1950 年代末，发表于 1980 年代初），《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 年第 3 期。

证可称为“数字讹误说”，直接排除了《索隐》《正义》两说皆误或两说均不误的两种可能，只能在第三种一真一假中作决断。第二步，王国维用数字讹误常理说推断：“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认为《索隐》的“年二十八”为“年三十八”之误。“三讹为二”史籍中有许多实证。推论孤证不立，王国维第三步考证司马迁行年来验证，这不仅是正确的方法，而且在没有发现古代版本以及地下文物证据的现实情况下，是唯一正确的方法。综上所述，王国维的考证有三长：一是立论坚实，“数字讹误说”不可动摇；二是用司马迁行年验证，是唯一正确的考证方法；三是逻辑严密，指其提炼论据由已知推未知。王国维考证三长，再具体条列如次。

1. 论点坚实

即立论基石“数字讹误说”不可动摇。王国维考证《索隐》《正义》两说依据同源，皆为西晋张华《博物志》所引《茂陵中书》。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是两说在流传中数字发生了讹误造成，即《索隐》《正义》两说必有一误。“数字讹误说”分为论点、论据两个方面。司马迁生年的“十年之差”，是《索隐》《正义》两说在流传中发生“数字讹误”，导致两说必有一误，即《索隐》《正义》两说一假一真，此为论点。数字分书的“鲁鱼亥豕”常理：“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是用于推理的工具，是无可辩驳的常理。王国维用数字分书“鲁鱼亥豕”常理推论《索隐》的“年二十八”，乃“年三十八”之讹，此为论据。即便是王国维的这一推论不成立，只是一个论据不立，而其论点“数字讹误说”并未推倒。“前135年说”论者袁传璋，发现两位数字合写的“鲁鱼亥豕”常理：“‘二十’与‘三十’，罕见相讹；‘三十’与‘四十’，经常相讹。”以此为工具推论，则《正义》按语“年卅二”，乃“年卅二”之讹，这仍然合于王国维的“数字讹误说”，此为“论点坚实”四字的反证。可是袁传璋却别有用意混淆“数字讹误说”的论点与论据，声称他发现的两位数字合写的“鲁鱼亥豕”推倒了王国维的“数字讹误说”，用他自己的话说，此乃“大言欺人”之谎言，后面还将详细论说。